

一针见血 >>>

女大学生支教：别因公益误读了性骚扰之恶

文/房清江

7月23日，南京大学彩云尖山支教队在其微信公众号“彩云支教”发布一则声明，引发众多关注。声明称，自2018年7月13日支教队到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尖山乡尾坝村山顶小学开展支教项目以来，出现多起女队员被当地游民骚扰的事件，包括言语骚扰、行为骚扰、偷看换衣、偷内衣裤等。甚至在7月22日，有当地游民偷拍女队员洗澡，并将视频传播。他们随后报警，并决定提前结束支教。很快，偷拍支教女学生洗澡的人被警方抓获，系当地一名17岁辍学无业青年。

(7月24日《现代快报》)

支教女大学生遭遇村民性骚扰，一时引发大量关注。支教公益的崇高与性骚扰的下作形成了强烈反差，这或许是引发刷屏的无形推手。在很多人看来，大学生到边远农村支教，帮助改善当地的教育现状，给当地孩子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传递更优秀的教育理念，就会理所当然地受到当地人们的尊敬，并报以充分的善意，而诸如偷窥、偷拍之类的不耻行为，无异于恩将仇报。

理性来说，这其实属于认知的误区。性骚扰本是人性之恶，在不同的土壤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比如边远的乡村，绝不是想象中的全都是纯美与干



完善立法保护，是防止性骚扰的重要武器。
图片来源：《四川法制报》

净，而是一样会受到世俗尘土的侵染，甚至因为封闭与落后，可能保留一些恶习。公益确实充满善意，也的确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如支教队组织者也表示，前几年的支教中，当地村民待他们都十分热情友善，也有难忘的支教经历。而这些与支教女大学生遭遇性骚扰并不矛盾，恰恰折射出人性的复杂，也反映出了真实的乡村世界。

事实上，不止只是乡村，性骚扰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性，在多种场景中都会出现，包括一些特殊关系，比如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甚至还成为易发多发区域，颠覆了人们传统的认知。这都意味着，单纯人际道德的约束，很难成为制约和预防性骚扰不发生的保证。

将支教女大学生性骚扰事件归咎于下作村民的人性之恶，咎因于女大学生的涉世未深，并无不妥。倘若是因为公益而打上恩怨的色彩，显然有失偏颇。对公益抱以善待的期望

可以理解，却不能因为公益支教就认为理所当然地得到自觉的尊重与保护，乃至可以不设防，这未免太天真。

事实上，真正值得反思的，一是普遍的女性遭遇性骚扰的防范与保护问题，目前这方面的法律以及机制还比较缺乏，特别是得不到有效惩治，助长了恶习的泛滥，应当得到重视并加快完善，给女性定制法治的保护衣；二是自我保护意识需要加强，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出门在外，特别在陌生的环境中，都应注重保护自己，在工作与生活中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即便是支教也不能例外；三是支教组织者与地方对支教人员安全保护的疏忽，安全隐私方面考虑不够，生活条件安全保障欠缺，地方关照和治安保护疏松等等，而这些恐怕才是伤害公益爱心的根源。支教不能因为性骚扰而因噎废食，必要的防范不能因公益而懈怠，这才是应当吸取的教训。

一家之言 >>>

“长生疫苗”背后：“飞行检查”重在掷地有声

文/郑文

近日，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及“百白破疫苗效价不符合规定”两起事件备受关注。国家药监局将组织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进行飞行检查，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据7月23日《新京报》)

“问题疫苗”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国家监管部门将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进行“飞行检查”，应该说这是一种监管方式和手段的改进，期待“飞行检查”能够真正掷地有声。

“飞行检查”相对普通公众来讲，是比较陌生的概念。“飞行检查”最早应用在体育竞赛中对兴奋剂的检查，指的是在非比赛期间进行的不事先通知的突击性兴奋剂抽查。目前，“飞行检查”的模式正被延伸至政府诸多监管部门。在

食品医药监管领域，200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药品GMP飞行检查暂行规定》，建立了飞行检查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飞行检查”与明查暗访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被监管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检查，即不打招呼、行动敏捷的检查，这样一来，可以及时了解掌握真实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也有利于开展有效的执法监管。

长期以来，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执法监管手段总是“慢半拍”。广而告之式、应景式的执法检查，成了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也使得违法者完全有对策来化解、躲避监管。如此的执法监管生态，不发生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才怪。“飞行检查”更注重执法的隐蔽性和行动的快速性，避免执法信息失真，做到及时且有效依法予以查处，使违法者铤而走险的侥

幸心理难以得逞。

“飞行检查”式的监管对于不法者来讲，不失为一个强有力的撒手锏，但“飞行检查”不能仅停留在光说不练上。“飞行检查”说得好更要做得好，要掷地有声。让“飞行检查”重塑执法监管的社会公信力，必须在组织实施程序以及保密制度上下功夫。为了让“飞行检查”有效实施，还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媒体记者参加，这其实也是很好的社会监督。

谈“食”色变、谈“药”色变的食品药品安全，也令公众忧虑和不满，执法监管的“亮剑”也十分迫切与必要。期待着“飞行检查”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常态，彻底消除公众对食品药品安全的那一份纠结与不安。期待着“飞行检查”越来越多，并且落实到日常监管中去，从而有效推动监管手段的改进和提高。



谐音文字
趣人生



“德”与“得”

文/石川

人生在世，正常的人都祈望着“得”，只是祈望“得”的内容不同、层次不一。有人祈望着民心、得称颂、得尊重，乃是超凡之“得”；有人祈望着功名、得地位、得事业，乃是脱俗之“得”；有人祈望着知识、得学问、得才干，乃是高雅之“得”；更多的人则是祈望着衣食、得健康、得安全，乃是起码之“得”、普通之“得”、必需之“得”。但人们追求“得”的轨迹却逃不出马斯诺的需要层次论，一级一级往上求，力保基本的，力争高雅的，追求脱俗的，向往超凡的，从生存到发展，从生理到心理，从物质到精神，从外在到内在，从平凡到卓越，从卑微到崇高。不管求什么，也不管要追求哪一个层级，只要不妨害社会和他人的，都是无可厚非的，甚至还可被看作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有进取、有作为的表现。

大千世界，形形色色。有些人不愿付出和劳作，却盼望不劳而获，梦想“天上掉馅饼”，或是希望一夜暴富、一举成名、一步登天，兴许一时能获得别人的理解、同情和施舍，但终究是好景不长，并会沦为社会的负担和笑柄。有些人虽然身体力行，由于受到一些主客观条件制约，付出与得到却不成比例，甚至是劳而不得，但比起前者却是一个进步，因为这些人要么心智得到了启迪、要么肌肤得到了强健，“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铁律最终会帮助这些人收获应有的“得”。但更多的人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几分付出就有几分收获，会是劳而有“得”。

劳什么、以什么方式“得”，展现了人的境界、体现人的品质、彰显人的大小，也决定了“得”的性质。

以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方式去谋“得”，得之越多，他人和社会损之越多，这属缺“德”之“得”。以这种方式求“得”，兴许会得逞一时、风光一阵，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因果规律终会发生效应。这种人自然会受到法律的审判和惩处，或者会得到舆论的谴责和唾弃。像那些不择手段捞权、捞钱的贪官污吏，像那些欺世盗名的伪专家、伪权威，像那些将己“得”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卑鄙之徒，莫不是缺“德”之“得”者，终究不会有好的下场。这种人看似“得”了，最终却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品格、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根本。此所谓，缺“德”之“得”者，小人也。

而以利他、利社会、利国家之方式求“得”，“得”之越多，他

人与社会也会随之受益越多。这是有“德”之“得”。这种方式的求“得”之人，其本人兴许会一时“得”得很苦，甚至“得”不偿失，但终究会受到人们的赞许和爱戴，得到社会的肯定和尊敬。像钱学森、袁隆平这类科学家，像焦裕禄、孔繁森这类领导干部，像雷锋、郭明义这类平凡人物，都属于有“德”之“得”者。他们似乎看似没有得到什么，实际上却收获了大大的“得”，为万民所称颂，为社会所景仰。此所谓，有“德”之“得”者，君子也。

由此看来，“德”与“得”不仅只是音同，而且有着因果关系：“德”为“得”之基，有“德”方有善“得”。

当今时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人们的价值追求日益多元多样多变。中华民族正在朝着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迈进。面对这种形势，在求“得”的方式上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倡导和褒奖以“德”求“得”，营造“鄙视小人、谴责小人”“学习君子、争当君子”和“君子好名，求之有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社会风尚。用坚定的理想信念、鲜明的政治立场、高度的理论修养以及强烈的大局意识等好的政治品德，去赢取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践行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内涵的社会公德，去求得社会认同，获取广泛支持。遵循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公道正派、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内容的职业道德，去实现出类拔萃，赢得业界尊重。遵守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为要求的家庭美德，去享受生活，品味幸福。

一个人，拥有了良好的政治品德，并自觉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也便自然地造就了自己的良好品格。以良好的个人品格去谋“得”，坚持以“德”换“得”，自然会得其福、得其禄、得其寿、得其喜，而且“得”高境界、高品质、高形象，这样的“得”方属大“得”、长“得”、真“得”，可谓“得”得踏实、“得”得愉悦、“得”得称道。



扫一扫，
转发美文